



社科文献精品译库

〔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 著

郭方

刘新成

张文刚 / 译

郭方 / 校

现代世界体系

(第一卷)

16世纪的资本主义农业和欧洲
世界经济的起源

The Modern World-System I
Capitalist Agricultur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European World-Economy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By Immanuel Wallerstein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社科文献精品译库

〔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 著

郭方

刘新成

张文刚 / 译

郭方 / 校

现代世界体系

(第一卷)

16世纪的资本主义农业和欧洲
世界经济的起源

The Modern World-System I

Capitalist Agricultur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European World-Economy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By Immanuel Wallerstein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世界体系. 第1卷, 16世纪的资本主义农业和欧洲世界经济的起源 / (美) 沃勒斯坦 (Wallerstein, I.) 著; 郭方, 刘新成, 张文刚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 10

(社科文献精品译库)

ISBN 978-7-5097-4111-5

I. ①现… II. ①沃… ②郭… ③刘… ④张…
III. ①资本主义经济-经济史-世界 IV. ①F1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304707 号

· 社科文献精品译库 ·

现代世界体系 (第一卷)

——16世纪的资本主义农业和欧洲世界经济的起源

著 者 / [美]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译 者 / 郭 方 刘新成 张文刚
校 者 / 郭 方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 政 编 码 / 100029

责任部门 / 全球与地区问题出版中心
(010) 59367004
责任编辑 / 赵怀英 段其刚
刘 娟
电子信箱 / bianyibu@ssap.cn
责任校对 / 曹艳浏 陈晓永
项目统筹 / 祝得彬
责任印制 / 岳 阳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印 装 / 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 34.5
版 次 / 2013年10月第1版
字 数 / 617千字
印 次 / 2013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097-4111-5
著作权合同 / 图字 01-2012-1282 号
登 记 号
定 价 / 98.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Immanuel Wallerstein
The Modern World-System I
Capitalist Agricultur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European World-Economy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With A New Prologue

This edition is an authorized translation from the original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by
2011 © Immanuel Wallerstein published b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根据加州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译出

《社科文献精品译库》 学术顾问委员会

(按姓氏笔画排序)

- 于 沛 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史学会副会长
- 王 巍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考古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 王缉思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教授
- 朱云汉 蒋经国国际学术基金会执行长
- 汝 信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研究员
- 李 扬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
- 李培林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
- 步 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 汪 晖 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 张异宾 南京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教授
- 陆建德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 陈春声 中山大学副校长、教授
- 卓新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 罗志田 四川大学、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 周 弘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欧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 俞可平 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研究员
- 钱乘旦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 陶东风 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 黄 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 阎学通 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教授
- 谢寿光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社长
- 蔡 昉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
研究员
- 裴长洪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 潘家华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社科文献精品译库》出版者话

中国现代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是同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吸收世界各国的先进文明成果密不可分的，其中国外优秀学术著作的引进、译介和出版成为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发挥着前导、推动和促进的作用。对于欧美现代哲学社会科学的引进和译介可以追溯到1839年林则徐组织翻译的《四洲志》和1842年魏源汇编的《海国图志》。但较为系统地介绍和传播西方学术文化及其方法论和世界观，则肇始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其代表人物是严复、梁启超、蔡元培和高君武等一批著名思想家。他们的学术活动和对于译著的积极倡导，取得了丰硕成果，为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做了舆论和理论准备。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把严复与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并列，称之为“代表了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而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引进和译介在中国革命历史上的丰功伟绩更不待言。毛泽东曾经称赞《反杜林论》的译者“功不在禹下”。早在延安时代，中共中央就作出了“关于翻译工作的决定”。回顾从清末民初到“五四”运动，从中国共产党建立到20世纪30年代，从抗战胜利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从共和国初期到“文革”前夕，从“拨乱反正”到改革开放，从反对教条主义和极“左”思潮到今天的文化和学术的进一步繁荣的整个历程，体现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作为马克思主义精髓的伟力，同时也可以看到国人的思想解放、心智跃升与哲学社会科学领域里的国际交流、吸纳、融合、批判、抵御和斗争形成一种密切的互动态势。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以“创社科经典、出传世文献”为己任，在创建之初就把编辑出版反映当代国外学术思潮，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新兴学科、边缘学科及跨学科研究等学术动态的译著，作为其重点之一，先后推出了《社会理论译丛》、《资本主义研究丛书》、《政治理论译丛》、《当代西方学术前沿论丛》、《全球化译丛》、《阅读中国》等系列丛书，单书品种达300有余，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形成了自己的品牌特色。本着选择精品，推陈出新，持之以恒的精神，以及权威、前沿、原创的原则，

以 20 周年社庆为契机，我们在整合、提升和扩充既有资源，开拓创新的基础上，隆重推出《社科文献精品译库》，作为奉献给学术界和广大读者的新礼物。

《社科文献精品译库》作为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力求展示三方面的主要特色。其一是时代意识。众所周知，20 世纪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半个多世纪中，在科学认识的普遍进步和一浪高过一浪的科技革命的推动下，国际学术界思潮迭起，此消彼长，哲学社会科学经历着不断分化和整合的过程，无论在理论和方法论方面，或者在研究的方式、工具和手段上，都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社科文献精品译库》将突出当代的这种革命性变革，把译介比较系统、深入地梳理和论述这种变革的富有代表性的著述，当做首要的努力方向。

其二是问题意识。哲学社会科学领域里的理论内容的突破，引起理性认识和理论思维的基本方式的改变，促使科学认识中自觉的主体性原则日益突出，并导致整体认识论与个体认识论的融合，使人们有可能以具体化和量化的方式来描述世界的普遍联系，从而要求学科知识本身的不断革新，学科之间——不仅是哲学社会科学本身的各个学科之间，而且包括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各个学科之间——的开放和广泛合作，以及问题意识、跨学科意识和应用意识的不断加强。《社科文献精品译库》将以问题、思潮及其代表人物为主线，打破学科的单—界限和分类，整合成多个系列，突出理论和方法论研究本身的多重视角。

其三是开放意识。科学发展的意义本质上在于从不知到知的飞跃，逐步超越认识的局限性和相对性，不断接近客观真理。开放性成为一切科学研究的显性特征，尤其是在科学技术飞跃发展，社会变革不断深化，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的今天。《社科文献精品译库》坚持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指导下的开放和兼容并蓄的编辑方针，促进不同学派之间及每个学派内部的不同观点的对话和讨论，激励新见解、新观点和新思想的涌现。同时，在学科的类型布局上，也不拘泥于传统的范围和分类，更加侧重向多学科和跨学科综合性研究及著述开放。

我们将始终坚持把“弘扬科学精神，服务理论创新，译介世界精品，借鉴先进文明”作为编辑《社科文献精品译库》的基本理念。殷切期望学术界同仁、专家学者以及广大读者给予支持，不吝赐教和指正。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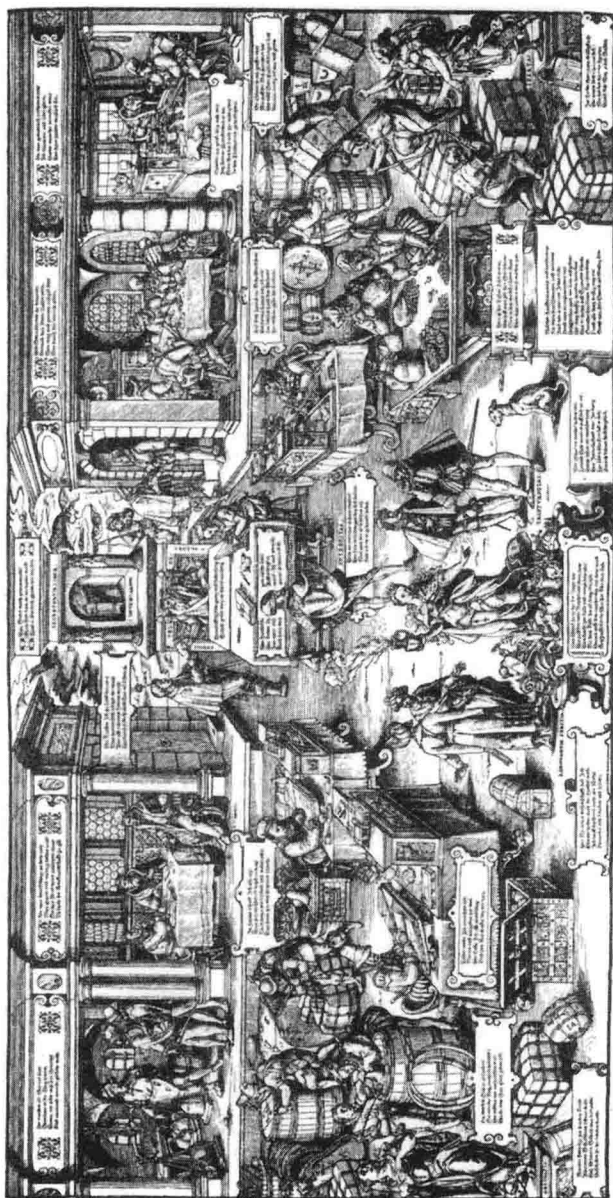
2005 年 6 月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 1930 ~ ），美国著名社会学家，“世界体系”理论的思想领袖和主要代表人物。

1930 年生于纽约。1954 年和 1959 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先后获得社会学硕士、博士学位。1958 ~ 1971 年，在哥伦比亚大学社会系任教。1971 ~ 1976 年任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社会学教授。从 1976 年起，任纽约宾厄姆顿大学社会学教授和“费尔南·布罗代尔经济、历史体系和文明研究中心”主任。1977 年起主编《评论》（Review）期刊。1993 ~ 1995 年任古本根重建社会科学委员会主席。1994 ~ 1998 年任国际社会学学会主席。2000 年起任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

沃勒斯坦著述颇丰，影响最大的著作是耗费 30 多年心血的《现代世界体系》（*The Modern World-System*）。《现代世界体系》英文版第一卷出版于 1974 年，2011 年加州大学出版社出版 4 卷本。其他著作有：《历史资本主义》（*Historical Capitalism*, 1983）；《世界的政治学》（*The Politics of World Economy*, 1984）；《所知世界的终结：二十一世纪的社会科学》（*The End of The World As We Know It: Social Science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1999）；《知识的不确定性》（*The Uncertainties of Knowledge*, 2004）等。近期的有《世界体系分析导论》（*World-System Analysis: An Introduction*, 2004）；《欧洲的普适价值：权力的话语》（*European Universalism: The Rhetoric of Power*, 2006）。



卷首插图 “贸易的寓言”

Jobst Amman (1539–1591).

“贸易的寓言”，阿曼（Jobst Amman）（1539 ~ 1591），他生活在纽伦堡（Nuremberg）。他是“小师傅”（Little Master）之一。在底部细节图中描绘了纽伦堡一个商人的大厅，它仍然是跨欧洲贸易的一个繁荣的中心。

2011 年英文版第一卷序言*

xvii

《现代世界体系》是 1974 年出版的，实际是在 1971 ~ 1972 年写作的。在为它寻找出版商时，我费了一些周折。这本书是有关 16 世纪的历史，它研究的是一个当时还几乎不为人知的论题：一种世界 - 经济 (world-economy)，我拼写时有意加了一个连字符。该书的篇幅冗长，而且附有大量有实质内容的脚注。当它出版后，一位不太友好的评论者抱怨，脚注爬满了页面。最终，学术出版社 (Academic Press) 和它那时的学术顾问查尔斯·蒂利 (Charles Tilly) 决定冒险一试，将它列入他们新出版的社会科学系列丛书。

它出版时受欢迎的程度令所有人，尤其是令出版商和作者感到意外。它受到《纽约时报》的“周日图书评论”专栏 (在头版) 和《纽约图书评论》的好评。1975 年，它获得美国社会学协会颁发的最优秀学术出版物奖，当时这个奖项被称为“索罗金奖” (the Sorokin Award)。获得这个奖非常出乎意料，我甚至都未能出席颁奖大会。该书很快被翻译成多种其他文字。就一本学术专著而言，它的销售也非常之好。从任何标准来衡量，它都是成功的。

不过，它也很快就被证明是一本引发很大争议的书。尽管它获得很好的赞誉，但却同时也是被激烈指责的对象，这些指责来自许多不同的阵营。在最初出版的 37 年之后写作序言，我认为值得对这些批判做出回应。这些批判从何而来？到今天，它们还能在多大程度上保持其有效性？我自己现在又是如何看待这些批判的有效性？这些批判又是如何影响我以后几卷书的写作？

开始回应之前，我须说明一下这些批判背后的一个未曾言明的特定背

* 2011 年英文版序言等由吴英翻译。吴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景。从专业上说，我是一位社会学家。对许多人而言，这本书似乎是一部经济史方面的著作。至少在 20 世纪 70 年代早期，社会学家并不被认为会对写作 16 世纪的历史或对经济史学家研究的问题感兴趣。另一方面，历史学家也对来自大学其他学科的人侵者持保留态度，尤其是当他们几乎完全依赖所谓的二手资料来写作的时候，就像我这样。进一步而言，本书研究的中心问题是全球的空间关系，这被假定为地理学家的研究范畴。最后，在本书的早期爱好者当中有一个我意想不到的群体：一些考古学家。因此，我似乎是在反对那时对各种学术研究做出分类的学科划分，而未落入在知识结构中通常被明确规定的框架。

xviii

首先应该介绍一下在写作本书时我自己的一些想法。在本书的导言中，我解释了我是如何写作它的。当时我有一个糟糕的想法，即通过研究在 16 世纪“新兴的”国家是如何“发展”的，也许能更好地理解 20 世纪“新兴国家”的发展轨迹。这之所以是一个糟糕的想法，是因为它假设所有国家都将遵从相似的演进路线，有时被称为“发展”。不过，这种糟糕的想法也有意外收获。它使我能够解读 16 世纪的西欧，将我的注意力转向一些我未曾预料到的史实。

那时，在我的思想中主要是要反驳韦伯学派的社会学——不仅反驳韦伯本身，而且反驳 1945 年之后美国（在某种程度上是世界）社会学对他提出的许多范畴的应用。韦伯论新教伦理的著作在 1945 年以后的时期被广泛解释为，某些类型的价值观的存在是实现现代化或（经济）发展的一个必需的先决条件。那时，通常的学术研究程序是一个国家接一个国家地考察这种价值观是否存在或将要存在。结果，就是构建了一种进步过程的编年时间顺序。哪个国家是最先进步的？哪个国家是接着实现进步的？哪个国家是现在将要实现进步的？作为一个衍生问题，一个国家为了实现进步现在必须做什么？

我试图从几个方面对这种解释方法提出质疑。首先，我坚持认为，这种进程不能逐国地做出考察，而只能在一个较大的范畴内去考察。这个范畴，我称之为一种世界体系（“世界”一词并不是“全球”一词的同义语）——这里我用的是“一个世界”，而不是“这个世界”，正如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所表述的那样。

其次，我提出，所涉及的价值观是伴随正在发生的经济转型而发生的，而不是在它之前发生的。我提出，只有通过将各个国家置于它们彼此

的关系中来考察，才能理解为什么一些国家在生产效率和财富积累方面成为领先者。

最后，我反对 1945 年之后韦伯学派所强调的主要对立关系，即现代同传统的对立关系。相反，我赞同像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和安德烈·贡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等所谓依附论者（dependistas）不断发展的观点。他们认为，“传统”和“现代”一样都是近代的产物，两者是一前一后出现的。因此，我们能够用弗兰克著名的说法谈论“低度发展的发展”。^①

我预想会受到 1945 年之后的韦伯学派的指责。但他们只是不接受我所论证的观点，一般还是会大体有礼貌地听取我的论证，尽管他们似乎认为我是在重提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他们相信后者已经被严肃的学者所抛弃或应该加以抛弃）。我认为，他们是对下述事实感到惊诧，即我是真的在埋头钻研 16 世纪的历史，而他们中许多人只是简单地依赖对韦伯命题的简单化总结（有时是曲解）来对 20 世纪的材料做出解释。进一步而言，正如特伦斯·霍普金斯（Terence Hopkins）和我在此后不久合写的一篇文章中所提到的，这种所谓的由现代化理论专家所做的比较分析，大多是将有关一个非西方国家的当代数据同假设的（而不是通过经验研究获得的）有关美国（也或许是某个西欧国家）的数据进行比较。^②

xix

尽管如此，但是最重要的攻击来自其他方面。有三种主要类型的批判。我也将这些批判视为主要的批判。这些批判，反对世界体系分析作为一种分析方法的理由在于它同他们的分析方法不一致，而他们认为他们的方法明显更胜一筹。还存在一些我认为次要的批判。这些批判，是由那些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承认世界体系分析合法性的人提出的。他们反驳我所做的详细历史描述的根据是说我某些重要经验资料的叙述或解释是错误的，或者说我忽视了某些重要的资料。还有第三种类型的批判，它们只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才提出。他们试图通过去掉连字符和复数来修正世界体系分析（world-systems），即坚持认为，在过去 5000 年一直只存在一种“世界体系”（world system）。让我们依次地考察这每一种类型和亚类型的批判。

主要的批判

如果说 1945 年之后的韦伯学派认为我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话，那么

“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则认为我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恰恰相反，是“新斯密主义者（neo-Smithian）”。^③就这里所言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我指的是某个马克思主义政党所信奉的马克思主义，即由德国社会民主党所信奉的马克思主义、由苏联共产党所信奉的马克思主义，乃至由大多数托洛茨基派政党所信奉的马克思主义。

尽管在他们的政治发展战略上和他们对20世纪各国所发生的政治事件的解释上，这些政党之间存在着根本性差别，但他们确实拥有某些共同的基本前提。第一个是有关资本主义制度下阶级斗争的性质，他们将它界定为本质上是在新兴的城市无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生产商（主要是工业企业家）之间展开的。第二个是有关经济基础相对政治和文化上层建筑而言具有首要性。第三个是有关在因果解释中内部因素（即一个国家内部产生的那些因素）相对外部因素（即在一个国家外部产生的那些因素）而言具有首要性。第四个是有关进步的必然性，即沿着一种由不同的所谓生产方式组成的序列做必然性的演进。

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的指责是，世界体系分析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违背了所有这些前提。但这种指责，事实上在某种程度上证明了我们分析的合理性。在提及《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时，这些批判者论证，我提出的是他们称之为“循环主义”的论证，而我应该根据在生产领域发生的现象来解释问题。那就是说，当我在讨论中心区和边缘区的关系时，我忽视用英格兰内部的阶级斗争来解释资本主义的发展，而赞成将之归因于某种被视为外部的因素，像美洲和西北欧之间贸易流动的特性。

当然，直接的问题是对于什么而言的内部性或外部性？对正统马克思主义者而言，内部性一直被界定为一个国家政治边界内部的因素。“经济”是国家结构的一个组成部分。阶级也是国家的组成部分。正是国家能够被称为资本主义的或非资本主义的。这场争论是具有本质意义的。在争论过程中，我提出了一种有关资本主义的替代性观点。在我看来，资本主义具有世界体系的特征，是一种我称之为“世界经济”的特定类型的世界体系。国家结构是在这种世界体系中存在的。

来自这个阵营对我提出批判的人非常顽固地坚持他们的观点。不过，在这些年中，他们在数量上变得越来越少。这与其说是同我著作的影响有关，不如说是由现代世界体系中不断变化的情势造成的。至迟到20世纪60年代，持有这种观点的政治运动受到构成1968年世界革命的各种力量

的深刻挑战。由于一些强大运动的兴起，他们被迫转入防御地位，这些运动在分析社会现实时坚持强调性别、民族、种族和性的重要性。由于在 20 世纪 80 年代，新自由主义在政治上做出的反击和一个被称为全球化的概念被人们普遍接受，他们同样被迫处于防御地位。作为结果，在今天仍然信奉正统马克思主义在 20 世纪 60 年代所持传统分析方法的人，相对已经很少。

还有来自被我视为正统马克思主义分析方法最后一道防线的思想立场的批判。这些批判者来自被称为“多种生产方式互相联系”的思想流派，在 20 世纪 70 年代曾非常有影响。^④在我看来，这个学派所做的是承认下述论点，即人们不可能仅仅在一个单一国家的限度内来分析社会现实。他们看到了在世界体系中正在发生的情况，尽管他们避免使用那种说法。从本质上看，他们所做的修正是提出，尽管一个国家也许是资本主义的，而另一个国家仍然是封建制的，但它们却以特定的和重要的方式彼此联系在一起。他们指出，两种生产方式是彼此“相互联系”的，因此每种生产方式都以某种方式受到另一种生产方式的影响。

xxi

我认为，这种折中方法既不令人信服，也没有给人们理解社会现实的能力增添任何重要的东西。但不管怎样，在流行了十年左右之后，这个学派已经销声匿迹。我想不出在今天还有谁在继续利用这种框架进行分析。

另一个对世界体系分析持非常敌视态度——几乎完全敌视——的学派是由传统的、研究普遍性规律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组成。对他们而言，当他们确实愿意关注它时，往好里说是新闻写作，往坏里说是意识形态论述。总之，他们轻蔑地否定了世界体系分析。他们甚至不屑对它做出讨论，除了当他们被邀请担任科研基金项目申请的匿名评委的时候。

他们蓄意的忽略掩盖了一种忧虑。这个学派将世界体系分析视为是危险的，正像他们将正统马克思主义视为是危险的一样，尽管那是出于非常不同的理由。他们确实意识到他们所面临的岌岌可危的情势。斯蒂芬·门内尔（Stephen Menell）最近正确地指出，我的书

实际上是从历史方面反驳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揭示的、永恒存在的“比较优势规律”的一次重大努力。它表明，最初在各种社会和经济之间相互依赖关系中的不平等程度是多么的小，但随着时间的变化，不平等程度被不断加剧，以致产生在今天被委婉地称为

“北方”和“南方”之间的巨大差别。^⑤

由于李嘉图所揭示的规律实际已经成为主流宏观经济学主要的和决定性的前提，所以我的论点受到这个阵营如此负面地对待，并不令人感到奇怪。

不过，由于世界体系分析在知识圈中获得的影响力，这个研究普遍性规律阵营中的一些人确实开始提出一些分析，意在从经验上反驳由我们提出的、被他们视为异端的假说。这些批判者特别渴望揭示，世界体系分析并未能解释在当代世界为什么一些国家比其他国家更为“发达”，也未能解释为什么一些所谓的欠发达国家比其他欠发达国家更能改善其境遇。像正统马克思主义者一样，来自这个阵营的反对同样顽固，而且影响也许会
xxii 更为持久。

还有第三种主要的批判。它来自我视为新欣策主义（neo-Hintzian）的学派。奥托·欣策（Otto Hintze）是一位德国的政治史学家，他被认为在其著述中证明了政治领域相对于经济领域而言具有自主性。我遭到了两种主要的批判，^⑥他们都特别援引欣策的观点作为论据。他们都指出，我错误地将政治和经济两个分析领域合并为一个单一的领域，实际赋予了经济领域以首要性。

当然，事实上我坚持认为政治和经济两个变量是存在于一个单一领域中的。我拒绝接受下述论点，即政治领域具有自主性，或它是由在某种程度上不同于——甚至对立——那些支配经济领域的法则支配的。我在书中坚持一种整体主义的分析方法，认为政治制度和其他制度一样仅仅是现代世界体系中的一种制度。尽管我试图在随后的几卷，尤其是第二卷，详细地说明这种将两个领域分割开来的错误，但这种批判已经表明它继续存在下去的能量。在今天仍有许多人将世界体系分析视为太过于“强调经济因素的作用”，在他们的意识中，这样说通常就是指它太过于“倾向马克思主义”。

总之，新欣策主义者对奥托·欣策的忠诚并不比新韦伯主义者对马克思·韦伯、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对卡尔·马克思，或斯密主义者对亚当·斯密的忠诚程度更高。就奥托·欣策而言，在《资本主义时代的经济和政治》一文（发表于1929年）中，他对他的观点做了这样的总结：

总而言之，战争年代和随后的十年并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资本主义